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六編 16

# 臺灣威權體制下的 知識分子

余凱·著



#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輯刊

六 編

第 16 冊

臺灣威權體制下的知識分子：  
以雷震為個案的研究

余 凱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威權體制下的知識分子：以雷震為個案的研究／余凱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103〕

目 4+186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六編；第 16 冊)

ISBN 978-986-322-959-9 (精裝)

1. 知識分子 2. 威權政治 3. 臺灣

733.08

103015091

ISBN-978-986-322-959-9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六 編 第十六冊

ISBN：978-986-322-959-9

臺灣威權體制下的知識分子：  
以雷震為個案的研究

作 者 余 凱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9 月

定 價 六編 21 冊 (精裝) 新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臺灣威權體制下的知識分子：  
以雷震為個案的研究

余 凱 著

## 作者簡介

余凱，男，1979年生，湖南汨羅人。1998年至2005年求學於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先後修讀行政管理和中外政治制度專業，分獲管理學學士和法學（政治學）碩士學位。2005年至2008年在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研修政治學理論專業，獲法學（政治學）博士學位。畢業後一直任教於湖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現法學院）政治學系，助理教授，任政治制度教研室主任；同時在湖南大學廉政研究中心、民主理論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工作。

## 提 要

臺灣政治轉型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宏觀上看，市場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的興起、多元文化的形成都是臺灣政治轉型的客觀條件；從微觀上看，臺灣政治轉型是威權當局與要求民主的反對派之間長期鬥爭與妥協的結果。在微觀研究中，知識分子的作用雖然受到研究者的注意，但缺乏系統的研究著作。本書則試圖以雷震為個案，探討知識分子在臺灣威權體制下扮演的角色，及其對臺灣政治轉型的貢獻。

除導論和結論外，本書由四章構成。在對雷震做個案研究之前，第一章考察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傳統和臺灣威權體制的結構。中國知識分子是一個具有深厚的政治傳統的社會群體，他們關心社會現實和公共事務，並對現實政治持批判的態度。這樣的政治傳統，加上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使他們與對社會進行嚴密控制的威權體制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衝突。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對雷震的個案研究，這是本書的主體部分。雷震是臺灣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他主持的《自由中國》雜誌，堅持不懈地對臺灣威權體制展開批判；而為了實現自己的民主理想，他還參與並領導了臺灣威權體制下的第一場民主運動——「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這兩章詳細考察了雷震遷臺後的政治思想與政治活動，及其與臺灣威權體制的衝突，從而揭示出雷震在臺灣威權體制下扮演的角色。

為彌補個案研究的不足，本書第四章選取胡適、殷海光、吳國楨與雷震進行比較研究。通過比較研究，筆者發現，臺灣威權體制下知識分子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殷海光與雷震一樣，是「體制外」的反對派；吳國楨是「體制內」的諫議者；胡適則扮演著介於「體制內」與「體制外」之間的「諍友」角色。

在對知識分子的角色進行分析的過程中，本書發現知識分子在兩個方面推動了臺灣的政治轉型。第一，知識分子堅持不懈地對臺灣威權體制進行批判，將自由民主的觀念傳播到全社會，對臺灣民眾起到了很好的啓蒙作用，有利於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這是臺灣政治轉型的重要前提之一。第二，知識分子傳播的民主觀念，促進了民主運動的發展，推動了民主力量的成長；而知識分子參與民主運動，更是直接構成了民主力量的一部分。民主力量的不斷壯大對威權體制構成了直接威脅，迫使臺灣當局不得不採取「政治革新」的政策，從而推動了臺灣的政治轉型。

在個案研究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本書認為：知識分子是威權體制的重要制衡力量；知識分子是威權體制保持社會穩定或實現「和平轉型」的重要因素。



# 目次

|                            |    |
|----------------------------|----|
| 導 論                        | 1  |
| 一、問題緣起與研究意義                | 2  |
| 二、核心概念與研究路徑                | 7  |
| 三、雷震個案與雷震研究                | 15 |
| 四、研究方法與篇章結構                | 31 |
| 第一章 知識分子與臺灣威權體制的內在衝突       | 33 |
| 第一節 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傳統            | 33 |
| 一、中國士大夫的政治傳統               | 33 |
| 二、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            | 42 |
| 第二節 臺灣威權體制的結構與知識分子的活動空間    | 48 |
| 一、戒嚴體制：臺灣威權體制的基礎           | 49 |
| 二、「黨國威權體制」                 | 52 |
| 三、臺灣威權體制的縫隙                | 55 |
| 四、知識分子的活動空間                | 59 |
| 第三節 臺灣威權體制下的知識分子           | 61 |
| 一、衝突的先聲：「二二八」事件            | 61 |
| 二、威權體制下的知識分子               | 64 |
| 第二章 民主觀念的傳播：《自由中國》對威權體制的批判 | 69 |

|                             |     |
|-----------------------------|-----|
| 第一節 《自由中國》：知識分子「挽救人心」的努力    | 69  |
| 一、創刊背景                      | 69  |
| 二、創辦經過                      | 72  |
| 三、雷震對創刊的貢獻                  | 75  |
| 第二節 從反共到批判威權：《自由中國》的主題轉換    | 76  |
| 一、初期反共                      | 76  |
| 二、批判威權                      | 79  |
| 第三節 從「體制內」到「體制外」：雷震與國民黨分道揚鑣 | 97  |
| 一、對國民黨改造的異議                 | 97  |
| 二、批判威權的代價                   | 102 |
| 三、從分裂走向對抗                   | 106 |
| 本章小結                        | 109 |
| 第三章 民主力量的成長：「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 111 |
| 第一節 反對黨：臺灣知識分子的民主理想         | 111 |
| 一、《自由中國》的論述                 | 111 |
| 二、雷震的主張                     | 117 |
| 第二節 雷震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 124 |
| 一、組黨運動始末                    | 124 |
| 二、對雷震參與組黨運動的評價              | 129 |
| 第三節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與臺灣政治轉型      | 132 |
| 一、民主運動與民主力量的成長              | 132 |
| 二、「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意義            | 134 |
| 本章小結                        | 136 |
| 第四章 臺灣威權體制下的知識分子之比較         | 137 |
| 第一節 雷震、胡適、殷海光與吳國楨之比較        | 137 |
| 第二節 「學者型官員」吳國楨              | 140 |
| 一、主政臺灣省                     | 140 |
| 二、民主作風                      | 143 |
| 三、諫蔣失敗                      | 146 |

|  |     |
|--|-----|
| 第三節 「兩棲學者」胡適 .....                       | 147 |
| 一、「諍友」胡適 .....                           | 148 |
| 二、「院長」胡適 .....                           | 156 |
| 第四節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 .....                     | 159 |
| 一、臺大「精神磁石」 .....                         | 159 |
| 二、《自由中國》的「臺柱」 .....                      | 161 |
| 三、「自由思想者」的孤寂 .....                       | 164 |
| 本章小結 .....                               | 167 |
| 結 論 .....                                | 169 |
| 參考文獻 .....                               | 173 |
| 附錄：《雷震全集》一覽表 .....                       | 183 |
| 後 記 .....                                | 185 |
| 圖 次                                      |     |
| 圖一：臺灣政治轉型過程示意圖 .....                     | 13  |
| 圖二：研究路徑示意圖 .....                         | 15  |
| 圖三：威權體制下權力、意識形態與媒介關係組成<br>.....          | 30  |
| 圖四：改造後的中國國民黨組織結構 .....                   | 53  |
| 圖五：殷海光、胡適、雷震、吳國楨與國民黨當局的<br>關係示意圖 .....   | 168 |
| 表 次                                      |     |
| 表一：臺灣高等教育從業人員統計表(1949~1960)<br>.....     | 65  |
| 表二：薛化元對《自由中國》有關臺灣民主憲政之<br>文章的分類與統計 ..... | 80  |
| 表三：雷震、胡適、殷海光與吳國楨的基本情況 ..                 | 138 |

## 導 論

1960年9月4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以「涉嫌叛亂」為由，將《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雷震和《自由中國》編輯傅正、經理馬之驢、前會計劉子英逮捕。雷震等人被捕後，海內外一片譁然，抗議聲不斷。然而，這一切都沒有阻止國民黨當局「懲罰」雷震的決心。10月8日，軍事法庭以「知匪不報」、「涉嫌叛亂」等罪名判處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七年。

1986年3月底，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政治革新」的方針和以「政治革新」帶動「行政革新」以至「全面革新」的政策。1987年7月15日，臺灣當局解除了長達38年的戒嚴。1988年，蔣經國臨死前解除了「報禁」，放開了言論。1989年1月，臺灣通過《人民團體組織法》的立法程序，「黨禁」正式解除，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正式取得合法地位，其它政黨則如雨後春筍般地相繼成立。1996年，以「修憲」、「國會」全面改選和「總統」直選為標誌，臺灣實現了政治轉型。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民進黨擊敗長期執政的國民黨，陳水扁當選「總統」，臺灣實現了第一次政黨輪替。

2002年9月4日，臺北「國史館」正式出版《雷震案史料彙編》，並舉行新書發佈暨「雷震案」平反大會。陳水扁在致詞中表示：「雷震先生對民主自由理念的堅持，一直是臺灣戰後民主運動參與者的重要標竿，他主導《自由中國》雜誌所刊載的文章，也曾經灌溉了許多崇尚自由民主的幼苗；從撰文鼓吹到著手推動，寫下戰後臺灣民主運動一頁無法磨滅的歷史。」〔註1〕

〔註1〕「雷震案／不容青史盡成灰 陳總統致詞全文」〔EB/OL〕，<http://www.ettoday.com/2002/09/04/319-1348106.htm>，2007-10-12。

從逮捕雷震到為雷震平反，從時間上看，前後相隔四十二年；從政治結構來看，則先後發生在威權與民主體制之下。這一前一後，體現了威權與民主對待歷史的不同態度，〔註2〕也體現了兩者對待知識分子的不同態度。

## 一、問題緣起與研究意義

本書的選題來自於筆者對臺灣政治轉型問題的長期關注。政治轉型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體制發生結構性轉變的過程。嚴格說來，政治轉型包括極權體制向威權體制或民主體制的轉變、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的轉變，也包括民主體制向威權體制的「復辟」。但在當代政治學研究中，它幾乎等同於威權體制的民主化轉型。

學術界關於政治轉型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註3〕第一類側重於從宏觀著手，尋找民主化的客觀條件，關心社會經濟的長期發展，注重政治體系變化的外部條件和結構性因素，這種研究方法被稱之為功能主義的研究方法，或稱為宏觀導向的研究。綜合研究者們的觀點，我們可以將民主轉型的客觀條件歸為如下幾類：（1）經濟前提。民主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不一定能帶來民主轉型，但民主轉型需要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雖然我們不能確定民主轉型的經濟門檻到底是多少，但並不能因此否認民主轉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關性。經濟發展將催生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還會促進教育的發展，這些都是有利於民主的條件。（2）政治前提。政府能夠維護社會的基本秩序而不至於使其崩潰或陷入動蕩不安的狀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可以得到基本保障。離開這個條件，社會無法正常運轉，政治轉型也無從開展。（3）文化前提。民主需要人們具備民主的意識、信仰和態度。「無論古典的民主理論還是當代的民主理論，都確認民主需要一整套獨特的公民的政治價值取向。它們大體上包括：節制、寬容、謙恭、功效感、知識、參

〔註2〕 參見社論，異議聲的可貴〔N〕，臺北：聯合晚報，2002-9-5。

〔註3〕 這種兩分法最早是由澤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在《民主轉型研究中的幾個問題》（1986）一文中提出來的。1995年，普利漢姆（Geoffrey Prindham）在由他主編的《向民主轉型：對南歐、拉美和東歐的比較研究》一書的導言中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在1997年出版的《民主化》一書中，主編D·波特爾（David Potter）則將關於非西方國家民主化的前提的各種理論歸納為三種模型：現代化理論、轉變研究和結構研究。參見燕繼榮，發展政治學：政治發展研究的概念與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271～272。

與等。」〔註4〕教育、大眾傳媒和宗教在民主文化的傳播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

（4）外部環境。這主要是指民主國家的示範效應。西方民主國家的憲政民主制度一直對後發國家的民眾和政治領導者產生著巨大的吸引力，甚至是後者孜孜以求的目標。這種示範效應使後發國家在國家建設的初期就面臨著社會要求民主的巨大壓力。如果說後發國家的政府能以「西方民主不合本國國情」為理由而繼續維持威權統治的話，那麼，在最近的民主化浪潮中率先實現民主轉型的國家對相同類型的國家或周邊國家產生的示範效應則更加明顯，也更加真實。

有時候，事物的優點往往就是它的缺點，功能主義的研究正是這樣。這種研究的優點在於它的宏觀視野，缺點則是過於宏觀、概括，無法描述任何一種政治轉型的具體情況，從而也就不能對政治轉型進行確切的分析。而且，相當多的學者在運用功能主義的方法作比較研究時，往往簡單地把西方發展了幾百年的民主的結果視為發展中國家開始向民主轉型的前提條件，這樣容易讓人們認為民主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奢侈品，從而對民主失去信心。此外，功能主義的一個內在缺陷是它易於落入決定論的窠臼。它假定，一旦政治轉型的條件全部滿足，則政治轉型不可避免。而我們知道，任何事件的發生或成功，除了需要具備必要的客觀條件之外，還需要相關行動者的主觀努力。對於政治轉型來說，無疑還需要政治行動者的行動。否則的話，我們將無法理解許多國家或地區在政治轉型過程中所經歷的各種鬥爭、衝突甚至是戰爭，也無法理解政治菁英或民主人士為實現民主政治所作出的不懈努力。〔註5〕

由於功能主義存在這些缺陷，導致了第二類研究方法的流行。這類方法側重於從微觀著手，優先考慮政治轉型事件本身而不是政治之外的因素，把政治轉型視為具體環境中的各種政治行為者，尤其是政治菁英集團為了自己利益而進行競爭、衝突、協調、合作等的活動。〔註6〕這種方法是發生學的研究方法，或者稱為微觀導向的研究。

戰略選擇理論是發生學理論的代表，它是受到菁英理論的影響而逐漸形

〔註4〕 燕繼榮，發展政治學：政治發展研究的概念與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280。

〔註5〕 參見陳堯，新權威主義政權的民主轉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97。

〔註6〕 陳堯，新權威主義政權的民主轉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96。

成的。戰略選擇理論主要關注政治菁英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包括三個層次：統治菁英與反對菁英之間的關係、統治菁英內部的關係、反對菁英之間的關係。〔註7〕按照菁英主義的觀點，一個社會中總是存在著主導、控制社會的統治菁英與爭取自主、自由的反對派菁英，統治菁英與反對派菁英之間的衝突、鬥爭以及他們在政治舞臺上的更替往往會使社會朝向更為多元化、自由化的方向發展，從而促使社會不斷趨於民主化。〔註8〕另外，統治菁英以及反對菁英內部的不同派別都會根據自己的利益與政策主張，根據特定的政治形勢採取不同的政治戰略與策略。在戰略選擇學者看來，政治轉型是各派政治菁英之間鬥爭或妥協的結果。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一股民主化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從歐洲到拉丁美洲，從亞洲到非洲，不少國家和地區的威權政府紛紛垮臺，建立起民主或半民主的政治體制。這一現象，亨廷頓稱之為民主化的「第三波」。〔註9〕在這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中，臺灣地區引起了筆者的極大興趣。除了因為筆者是中國人之外，這種興趣還來自於臺灣政治轉型的「和平性」。自國民黨在臺灣建立威權體制開始，它就不斷面臨要求民主的壓力。其間發生的數次民主運動，雖曾造成流血，但並未發生大規模的暴力衝突。而威權統治當局最後作出重大讓步，實行「政治革新」，是臺灣政治實現和平轉型的直接原因。結合臺灣的實際情況和已有研究成果〔註10〕，筆者將臺灣政治轉型的條件簡述如下：

〔註7〕 郭定平，韓國政治轉型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20～21。

〔註8〕 陳堯，新權威主義政權的民主轉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98。

〔註9〕 〔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

〔註10〕 參見孫代堯，臺灣威權體制及其轉型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109～132；姜南揚，臺灣政治轉型之謎〔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3：9～18；姚禮明，在東西方的結合點上——臺灣政治體制變遷研究〔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179～180；王振寰，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臺灣的政治與社會轉型〔M〕，臺北：唐山出版社，1993；林佳龍，解釋臺灣的民主化——政體類型與菁英的策略選擇〔A〕，見：林佳龍，邱澤奇，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M〕，臺北：月旦出版社，1999：87～152；彭懷恩，認識臺灣——臺灣政治變遷五十年〔M〕，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Steve Tsang, Hung-mao Tien.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L. H. M. Ling, Chih-yu Shih, *Confucianism with a Liberal Face: The Meaning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Postcolonial Taiwa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60, No.1. (Winter,

(1) 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臺灣市場經濟發展繁榮，現代化成就顯著，為民主政治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現代化產生了一個力量日益強大的中產階級，形成了一個利益多元的市民社會，大眾媒體爆發式的遞增，民眾要求參與政治的呼聲越來越高，聲勢越來越大。國民黨威權政府越來越難以抗衡這股聲勢浩大的力量，為了緩和矛盾，只得被迫實行「政治革新」，以延續自己的統治。

(2) 文化多元。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臺灣統治當局標榜的意識形態，但是，三民主義本身便包涵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憲政思想體系〔註 11〕，並以「憲政」為依歸〔註 12〕。另外，臺灣是一個海島，它的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典型特徵：開放、多元。臺灣人到世界各地經商、旅遊，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加之教育、通訊、出版事業越來越發達，臺灣人普遍受到西方特別是美國的自由、民主、人權、個人主義等價值觀念的薰陶。在這種文化的衝擊下，臺灣不可避免地從一個半封閉、半開放的邊陲社會轉變為一個開放的、多元的社會。

(3) 地方自治。臺灣很久以來就有地方自治的傳統，臺灣人的自治訴求是非常強烈的。國民黨政權敗退到臺灣以後，也不得不實行地方自治，這就在臺灣威權體制內部埋下了「一顆從一元走向多元的種子」。〔註 13〕孫代堯認為，持續舉辦的地方選舉對國民黨是一柄「雙刃劍」，它雖然有利於國民黨紓緩參與危機、排放島內民眾憤懣情緒和收編地方政治菁英，卻不可避免地在臺灣地方社會層級創造了一個「政治社會」，形成一種「地方包

---

1998)，pp.55~82; Yun Fan. *Taiwan: No Civil Society, No Democracy*. In: Muthiah Alagappa.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4~190; 楊永生，臺灣政治轉型原因研究——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D〕，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葛永光，政治變遷與發展——臺灣經驗的探索〔M〕，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

〔註 11〕 姚禮明認為，「由於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中佔據正統的主流地位，蔣介石的法西斯主義傾向只是一股暗流，只能以曲折的形式表現出來。孫中山對蔣介石來說既是護身符，又是緊箍咒。」（姚禮明，在東西方的結合點上——臺灣政治體制變遷研究〔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188）

〔註 12〕 孫中山先生提出來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雖然廣受詬病，但它畢竟是導向「憲政」的。

〔註 13〕 姚禮明，在東西方的結合點上——臺灣政治體制變遷研究〔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194。

圍中央」的局勢，無意中培養了「威權體制的掘墓人」。(註14)

(4) 島內外的各種壓力。一是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一直受到國民黨內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抵制；二是黨外的政治反對勢力不斷壯大，各種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頻頻發生(註15)，強烈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獨裁，給予人民更多的權利；三是執政黨內逐漸形成了一個能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改革派；四是臺灣當局受到來自國外的壓力，尤其是美國要求其實行民主改革的壓力、鄰近國家如韓國、菲律賓改革的壓力等。另外，中國共產黨「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政策和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也對臺灣造成了一定壓力。

(5) 蔣經國的個人貢獻。對於臺灣的政治轉型，有人強調它的「自下而上」性，認為市民社會、中產階級和反對運動是其最大的推動力；也有人強調它的「自上而下」性，認為政治領導人，主要是蔣經國起到了關鍵作用，持這種觀點的人往往是國民黨的支持者。本書同意這樣一種觀點：從整個演進過程來看，臺灣的政治轉型是由下而上逐步推進的。但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蔣經國採取了一系列的開明措施，取得了「被動中的主動」。(註16)

由此可見，臺灣政治轉型是一個很複雜的現象。不過，我們可以按照發生學的觀點將其簡化為一條「主線」：臺灣政治轉型是臺灣威權統治當局和民主力量兩者之間鬥爭與妥協的結果，或者說是兩者長期「博弈」的結果。而經濟發展、文化多元等其他條件則可視為影響「博弈」過程的結構性因素。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作為民主力量的一員，知識分子不僅直接參加了與威權當局的「博弈」，他們의思想和言論還影響了這一過程的其他參與者，從而對威權體制的轉型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那麼，知

[註14] 孫代堯，臺灣威權體制及其轉型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117。

[註15] 需要指出的是，「臺獨」運動也是其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由於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是代表「中華民國」的所謂「外省人」的政權，所以「臺獨」運動也就披上了民主運動的外衣。其中的邏輯是：臺獨——不承認「中華民國」——反抗國民黨——要求民主。游盈隆則認為，在1984到1987年臺灣的關鍵時期，黨外反對勢力在集體領導下，表現可圈可點，如避談「臺獨」、避免直接挑戰蔣經國的權威等，是終結臺灣戒嚴體制的關鍵因素。See Ying-Lung You, *Elite Politics in the Process of Taiwan's Regime Change (1984~1987)*,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2 (1993), pp.93~125。

[註16] 姚禮明，在東西方的結合點上——臺灣政治體制變遷研究[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181。

識分子是怎樣參與這一進程的？他們對臺灣威權體制發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便是本書期待予以回答的問題。

研究知識分子在臺灣威權體制下扮演的角色，在理論上至少具有如下兩點意義。第一，有利於我們更清楚地理解臺灣政治轉型的過程。政治轉型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目前政治學界對臺灣政治轉型的研​​究，如上所述，側重於分析政治轉型的過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多屬於宏觀的研究。在微觀研究方面，民主運動的展開、蔣經國的個人貢獻和媒體角色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知識分子對政治轉型的作用，雖然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但尚未出現專門的研究著作。如果能對知識分子在威權體制下扮演的角色展開研究，也許能為我們更全面地理解臺灣政治轉型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

第二，可以豐富我們對中國知識分子以及對威權體制的理解。中國知識分子是一個有著極其深厚的政治傳統的一個群體，他們先後經歷了封建體制的解體，君主專制體制從萌芽、興盛到解體以及近代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的全過程。國民黨 1949 年後在臺灣建立的威權體制，使知識分子處在從未有過的政治環境之下。在這種威權體制的環境中，知識分子既要繼承以前的傳統，又要調整自己扮演的角色。如果能對知識分子與威權體制的互動過程加以描述與分析，則既能豐富我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了解，又能更好地了解（臺灣）威權體制。

## 二、核心概念與研究路徑

### （一）核心概念

#### 1、威權體制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政治體制的分類就一直是思想家和學者們關注的主題。他們基於不同的標準，採取了各種不同的分類辦法。按照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將各國（地區）的政治體制分為極權體制（totalitarianism）、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ism）與民主體制（democracy），是當代政治學的最主流的分類方法之一。國家完全控制或企圖完全控制社會的政治體系是極權體制，社會雖在國家控制下依然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政治體系是威權體制，社會具有較大自主性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國家的政治體系是民主體制。

嚴格來說，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又譯「權威主義」）既指一種意

識形態，也指一種政治形態。〔註 17〕本書主要從政治形態的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故簡稱為「威權體制」。按照林茲（Juan J. Linz）的權威定義，威權體制是「一種不需負責的有限多元主義的政治體系；沒有一套精緻的、主導性的意識形態但具有非常明顯的特殊心態；除了在某些發展時期之外，沒有廣泛而深入的政治動員；領袖個人或統治集團行使權力雖然不受形式上的約束，但實際上是完全可預期的。」〔註 18〕具體而言，威權體制一般具有如下特徵：第一，統治者的權力未經被統治者的同意，其行使缺乏憲法上的制約；第二，統治菁英通過各種手段籠絡各團體組織的菁英，組成公開的或心照不宣的寡頭統治聯盟；第三，武裝力量在政治系統中具有關鍵性的地位；第四，公民權利受到較大程度的限制，社會力量比較薄弱；第五，缺乏明確的政治意識形態，其制度化程度較低。〔註 19〕

威權體制是一種既不同於極權體制又不同於民主體制的政治體制，但由於它與極權主義之間的界限不夠明顯，導致很多人將兩者混用。而從理論上說，威權體制具有特定的含義，它與極權體制的區別主要在於國家（政府）對社會的干預程度不同：威權體制缺乏公眾的參與和憲法制約，要求人們服從統治者頒佈的命令，但他們只在有限的領域內行使自己的權力；而極權體制則企圖控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並策動全體國民積極地支持其政策。〔註 20〕換一種角度，我們還可以認為，威權體制只要求民眾遵守政府法令，不要試圖挑戰政府權威，但不尋求改造人們的思想，而極權體

〔註 17〕 陳堯指出，根據不同學者在研究時的側重點不同，威權主義概念至少被理解為五種形態：（1）一種政治體系的類型（Political System）；（2）一種政權形式（Political Regime）；（3）從具體制度的角度，被理解為一種國家類型；（4）從政治關係的抽象角度分析，被理解為維護特定統治關係的一種國家形式；（5）一種意識形態。筆者認為，前面四種形態很難作出嚴格區分，在此將它們一併歸入「政治形態」。參見陳堯，新權威主義政權的民主轉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8。

〔註 18〕 Juan L. Linz,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 In: Erik Allardt & Stein Rokkan (eds.), *Mass Politics: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255。

〔註 19〕 參見廖益興：臺灣地區威權統治下的政經體制〔D〕，臺北：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26～31。

〔註 20〕 〔英〕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45，「獨裁主義·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詞條。

制卻積極努力地試圖改造被統治者的政治思想和信仰世界。(註21)

對於威權體制本身，也有不少學者根據不同國家(地區)表現出來的具體特徵進行了分類。如，阿爾蒙德和鮑威爾將其區分為滲透性的威權體制、動員中的現代威權體制、前動員型現代威權體制等；M·沙林(Michael Shalin)從政權的目的出發，將威權主義區分為保護性威權主義和促進型威權主義；麥克利迪斯(Roy C. Macridis)將威權主義的政權劃分為暴政、王制政權、軍人政權、一黨政權等四種主要的類型；林茲則將其分為官僚政治軍人型政權、合作主義的權威政權、後民主期的動員型權威政權和後極權期的權威政權；等等。(註22)在過去的20年中，對威權體制使用最廣泛的一個概念，是奧唐奈提出的「官僚威權政體」。(註23)

根據某些學者的研究，戰後發展中國家的威權體制呈現出不同於傳統威權體制的某些特徵，因此被冠名為「新權威主義」。(註24)但是，在筆者看來，這些變化不過是威權體制根據環境而在形式、功能等方面作出的某些適應性調整，並不具有實質性的意義，所以本書不作嚴格區分，統稱為「威權體制」。

## 2、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概念來自西方。在英語中，表示「知識分子」的常用單詞有兩個，一個是 *intelligentsia*，一個是 *intellectual*。(註25)

[註21] Marcus E. Ethridge & Howard Handelman, *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11。關於威權體制與極權體制的區別，還可參見：Roy C. Macridis, *Modern Political Regimes: Patterns and Institution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6: 125~131；或：陳堯，新權威主義政權的民主轉型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6~27。後者對前者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概括。

[註22] 參見陳堯，新權威主義政權的民主轉型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3~37。

[註23] [美]安東尼·奧羅姆，政治社會學導論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2。

[註24] 參見陳堯，新權威主義政權的民主轉型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7~28、43~55。

[註25] 關於知識分子概念的討論，可以參見陶東風，導言 [A]、周憲，知識分子如何想像自己的身份——對於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若干定義的反思 [A]、許紀霖，知識分子是否已經死亡？ [A]，見：陶東風主編，知識分子與社會轉型 [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導言 1~40，1~27，28~58；黃平，知識分子：在漂泊中尋求歸宿 [A]、費孝通，論「知識階級」 [A]，見：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 [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12，99~106；葉啟政，誰才是「知識分子」？ [A]，見：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